

# 沸腾的清华园在欢唱

## ——1952—1965 年的清华大学民乐队

○刘 沫（1997 级水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民乐队一扫之前的萎靡，抖擞精神，借着三股东风，得以快速发展，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校民族乐队。这三股东风中，两股在清华校内：一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保留下来的音乐室，二是蒋南翔校长推行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一股在校外，即中国民族器乐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的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快速的发展。

### 音乐室指导下的民乐队

清华大学音乐室成立于1946年，清华大学从昆明返回北京复校后，指令张肖虎先生着手在迁校前成立的中乐部、西乐部的基础上组建音乐室，恢复并发展了艺术教育职能。1953年左右由音乐室组建民乐队，王震寰老师被指定为负责民乐队教学和排练的指导教师。此时国家政局稳定、



1957 年，民乐队弹拨声部和低音声部排练

学校支持有力，民乐队员们兴致昂扬、摩拳擦掌，蓄势待发。

1956年，全校共有包括民乐队在内的18个文艺社团，成员2100余人。据当时音乐室教师赵星塔先生评价，在各大学中，清华民族乐队属第一流的、仅次于民族学院文工团的专业乐队，民乐队的队员人数也一度达到了120人。

###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党、团领导下的民乐队

1952年至1966年，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蒋南翔校长十分注重通过文艺活动进行思想教育，他要求要把文艺社团办成一流水平，建议并亲自请专业团体的专家来指导，选派少数尖子到专业院校去培训。他还安排文艺社团到政协礼堂汇报演出，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检阅。

民乐队的王震寰老师也选派少数业务骨干去中央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团体跟随著名的民乐演奏家进修。与此同时，音乐室还会聘请专家来校指导大队排练，1956年5月，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的指挥曾寻就曾来清华给民乐队排练曲目《大联欢》。

1958年9月，清华各艺术社团组建为“清华大学民兵师文工团”，随后更名为“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由学校直接领导，下辖包括民乐队在内的12个队。

至1960年时，文工团发展为下辖14个队、1400余人的团体。校内的文艺团体也在1958年以后掀起一股创作的热潮：文艺要与国家发展的形势相结合，要与校园生活相结合，努力编创反映自己生活的新节目。一时间文工团创作节目达300余个，民乐队也编创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人民公社万岁》等曲目。

在文工团成立的同时，在蒋南翔校长的支持下，学校开始统一管理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文工团、体育代表队首批各优选了100名左右思想表现和专业学习皆优的集中队员，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训练。文艺社团骨干集中住宿制度在“文革”开始后取消，1984年9月恢复，至今仍在施行。

民乐队集中班在当时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大量的独立创作与改编乐曲和学生指挥的培养两个方面。当时很多乐曲总谱都是从专业乐团获得的，但是清华民乐队当时的乐器配置并不能够满足要求，于是王震寰老师和很多队员纷纷拿起纸笔，对原谱进行改编，如《公社饲养员》《几内亚舞曲》等。此外，虽然当时民乐队有王震寰先生指挥排练，但音乐室仍坚持培养学生指挥，从低年级选拔指挥候选人，在乐队排练中由王震寰老师和队里高年级的学长示范和辅导。中杰英（1955届动力）、张又文（1957届机械）等十余位同学在1952—1966年间先后担任民乐队指挥。

### 新中国民族乐队发展对 清华民乐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于民族器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相继成立了中

央歌舞团民族乐队（1952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队（1952年）、上海民族乐团（1952年）、中央广播民族乐团（1953年）、前卫文工团民族乐队（1956年）、中央民族乐团（1960年）等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民族器乐表演团体，是民族乐队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民族管弦乐队的建设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代表了以西方管弦乐队为范本的民族乐团交响化的发展道路。1954年该团确立了以“拉弦、弹拨、吹管、打击”四组乐器为基本结构的大型民族乐队体制，并改革了一系列民族乐器。

地处北京的清华大学民乐队，受到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影响极其深远。五六十年代，民乐队演出的很多乐曲如《花好月圆》《凤阳花鼓》《小白船》《苗族见太阳》等，乐谱均来自中央广播民族乐团。1956年，除了前面提到的指挥曾寻来清华大学为民乐队指导曲目《大联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也来大礼堂演出《春江花月夜》等曲目。1963年，民乐队还学习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民族管弦乐创作、演奏手法，集体创作了《丰收乐》。

这种影响在1984年中国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彭修文先生亲自来清华指导民乐队排练时达到了顶峰，并随着彭修文先生的弟子张大森先生执棒清华大学民乐队，又延续了25年。当然，这是后话了。

### 民乐队的艺术活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乐队的演出形式包括独奏、协奏、由集中队员组成的小乐队和全体队员的大乐队合奏。排练曲目有《采茶舞曲》《歌唱二郎山》《牧童短

笛》《二泉映月》《步步高》《金蛇狂舞》《梁祝》《翠湖春晓》《小放牛》《春江花月夜》等。

民乐队还经常与舞蹈队和合唱队密切合作，在大型活动中为舞蹈队伴奏。50年代初，民乐队还每周末在西大饭厅为舞会伴奏。校内面向同学的迎新和毕业、元旦、校庆演出，学校的接待演出以及重要的校外演出是必须参加的。除此以外，与文艺社团的其他队一样，民乐队秉承“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为同学服务”的原则，经常性地组织“下班”演出——到学生宿舍楼门口或楼道、到食堂、到合适时间的教室里演出，不管观众多少，都精神饱满地投入表演。

1956年10月28日，民乐队和舞蹈队在中山公园参加了为中共八大代表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举行的盛大的游园晚会。队员们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并且还和他们一起跳交谊舞。同年冬，民乐队参加北京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合奏曲目《苗族见太阳》获集体二等奖，队长张又文的琵琶独奏获一等奖。

1958年至1959年，民乐队参加了两次随团的重要演出，一是1958年12月2日，清华学生文工团在北京政协大礼堂，为在



1963年五一劳动节，民乐队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演出

京的政协委员和正在参加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代表1300多人举行了汇报演出；二是1959年4月，文工团一行270余人赴上海进行交流、访问演出，两次演出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1959年到1964年，清华文工团（1962年恢复为文艺社团）是每年北京五一劳动节联欢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民乐队又是参加联欢活动的主力之一。六年中，除1963年的五一劳动节联欢活动是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外，其余5年均是在颐和园举行。除了参加每年的五一庆祝活动，民乐队还随团积极参加国庆演出以及北京市的调演、元旦和春节去人民大会堂与市委大楼联欢等活动。

1964年5月1日庆祝劳动节的联欢活动上，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陪同外宾观看了清华民乐队和舞蹈队的演出后，作诗《颐和园“五一”春游纪盛》记录了此次盛会，其中“箫笛弦索齐奏，气球直放苍穹。大家翩翩起舞，无分各国宾朋”生动描述这一日清华民乐队和舞蹈队在颐和园欢庆的景象。

1965年10月1日，清华文艺社团80人参加国庆天安门游行的文艺方队，民乐队为“女民兵舞”“落子舞”等伴舞。晚上军乐队、民乐队到天安门广场为狂欢群众伴奏。

蒋南翔校长认为文艺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发展学生社会活动的兴趣和能力，培养学生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有很大的意义”。清华民乐队的故事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你听，沸腾的清华园在欢唱，岁月悠悠，闪亮的日子不曾被忘记。